

# 大批判材料

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

第10期

(总第23期)

中共苏州市委大批判组编

1977年7月8日

按：六月三十日，市委大批判组召开了“深入揭批‘四人帮’滔天罪行大会”，现将大会发言摘要印发，供各单位揭批“四人帮”参考。

## 剥画皮，揭老底，彻底摧毁 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体系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在省、市委的领导下，我市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全市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愤怒揭发了“四人帮”及其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华林森和他的同伙的反革命罪行，深入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为了进一步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彻底清算华林森一伙“三搞一篡”的滔天罪行，彻底摧毁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体系，我们着重对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体系的形成和扩展过程，对华林森反革命帮派的核心分子和基本骨干的反动政治面目，进行了揭露和剖析。

### 一、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体系是怎样形成和扩张的？

华林森是“四人帮”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体系是从属于“四人帮”的一股反动势力。华林森的这个反革命帮派是怎样形成的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把这个反革命帮派的核心人物——华林森、汪永珠、邹学琪、赵宝康、陈德滋、曹根男等人的来历和老底揭开来。

长期以来，华林森披着“老工人”、“老先进”、“老造反”的外衣，蒙蔽迷惑了不少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华林森在解放前就加入了黄色工会，就是一个一贯道徒，就参加过反苏反共游行。解放后，他用欺骗的方法要经济补助，用闹情绪的办法争当



“先进”。华林森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华林森的家庭和亲属也是乌七八糟的。他的堂兄是反革命分子，解放后被我镇压；姐夫是坏分子；叔父是资本家；妻弟是反革命分子，华林森就是从这样龌龊的环境里爬出来的。

根据群众揭发，华林森在文化大革命中根本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他是由长风厂走资派贺传林玩弄手法，把他塞进长风厂文革筹委会当主任的，当时华林森对担当这个职务，吓得要死，骂人说：“他妈的！你们要把我推上第一线当炮灰，是要送我的老命！”后来，华林森“发迹”之后，回忆这段丑史时，曾得意忘形的说过一句最能表露他本质的话，他说：“我是糊里糊涂中状元！”什么“糊里糊涂”！在篡党夺权上华林森是一点也不糊涂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这一句话却也相当真实的说明了，他根本就不是革命造反派。

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中那个女掌柜汪永珠是一个长期隐瞒家庭出身的骗子。现已查明，她的父亲叫汪小四，是个在市镇上开茶馆、摆赌台的地痞，又是一个一贯道的引进师。解放后，汪永珠为了隐瞒其家庭的丑恶面目，竟然以“跟哥哥生活”为名，欺骗组织说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其实她的哥哥在解放前夕，跟随一个中统特务到台湾活动过几个月，解放后经常收听敌台，散布反动言论，有重大的政治嫌疑，清队时被华林森等人包庇下来。汪永珠就是在这样一个地痞流氓、茶馆、赌场，思想反动的家庭环境熏染下，学会了一套见风驶舵，两面三刀，投机钻营，投人所好，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资产阶级政客手段。她原在东北工作，后来通过走资派贺传林写条子、开后门才调到苏州长风厂的。来苏以后，又不安心在托儿所工作，竟然打骂儿童，甚至用罚跪、关禁闭等恶劣手段来发泄不满。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和人合写了一张大字报，后来她看到有利可图，便大吹特吹，混进了长风厂文革筹委会，当上了副主任。

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中那个翁森鹤式的黑干将邹学琪，是一个漏网的资产阶级右派，他靠打、砸、抢起家，以胡闹蛮缠而出名，寻衅闹事，横行霸道，无所不为，是一个反党恶棍。邹学琪的父亲邹培泉是一个“水火帮”土匪，直到解放初期还结伙抢劫我公粮船，被解放军鸣枪击中，受伤逃窜到外地，后被迫向我政府投案自首，被拘留惩处。邹学琪一贯恨党、反党。他在兰州一个工厂工作时，所在小组完成生产任务要报喜，他只向“政、工、团”报喜，故意不向党报喜。到了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邹学琪杀气腾腾地说：“有些共产党员的错误，靠整风改是不行的，要杀才行！”还鼓吹“今不如昔”，胡说什么“旧社会，我父亲一个人能养活几个人，现在我就不行了”等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削尖了脑袋钻进革命群众组织里，到了成立厂革委会时，他使用资产阶级政客的竞选伎俩，指使别人为他吹喇叭抬轿子，吹他“造反”的“功绩”。被他混进了厂革会。

华林森反革命帮派的狗头军师、“情报局长”赵宝康，原在东北工作，一贯表现恶劣，因贪污受过党纪处分，调苏州时，原单位组织上根据其一贯恶劣表现，明确提出不能当干部。可是赵宝康善于投机钻营，吹牛拍马，来苏州后，很快就受到走资派贺传林的赏识。文化大革命前，贺传林要提拔他做党委组织科副科长，但没有得逞。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群众揭发了赵宝康许多恶劣行径，赵宝康在厂里混不下去，摇身一变，跳出厂门，到市里投机“造反”。凭靠他投机钻营的本领，很快受到华林森的重用，后来成了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体系中特务情报系统的头子。

华林森、汪永珠、邹学琪、赵宝康，他们带着各自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在走资派的撮合下，聚集在一起，这样，一个反革命帮派的原始核心和最初的基础就在长风厂形成了。



在此以后，他们这个反革命帮派的核心又先后增加了反动文痞陈德滋和反革命打手曹根男。这两个家伙是靠武斗起家的。他们死跟华林森“三搞一篡”，为“四人帮”卖命效劳，得到华林森的重用，成了他们那个反革命帮派的核心人物。这两个家伙又是什么货色呢？

陈德滋的父亲在解放前担任过十多年伪法院的书记官。陈本人在一九四八年曾和他的师兄弟写信报考蒋匪帮的装甲兵团。陈混入我党后，一贯与党离心离德，热衷于个人争名争利争权。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苏州工农报》社工作期间，曾连续十一个月不缴党费，受到党纪处分，后来调到庆丰仪表厂，又是连续十一个月不缴党费。陈德滋是华林森反革命帮派的反动文痞，为“三搞一篡”造了大量反革命舆论，“四人帮”被揪出后，他恶毒攻击华主席、党中央，并狂叫要“准备杀头”，要“重上井冈山”，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曹根男本来就是市郊横塘镇上有名的地痞流氓。群众说他是“挺着肚皮，露出肚脐，拖着鞋皮，十足的地痞”。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依仗华林森的势力，篡夺了郊区领导大权，成了华林森反革命帮派在郊区的黑“司令”，他对贫下中农实行法西斯专政，敲诈勒索，为非作歹，是个吸血鬼，新“恶霸”。就是这样一批家伙，组成了华林森反革命帮派的核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华林森一伙正是被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卷而漂浮在一起的一些沉渣。长期以来，他们把自己打扮成苏州市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欺世盗名，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现在我们要彻底撕掉他们这张画皮，还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在苏州来说，就是华林森一伙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他们哪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他们是窃取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扒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华林森帮派体系形成和逐步扩张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他们逐步窃取群众斗争的胜利果实，篡党夺权的过程，他们独吞了长风厂群众斗争的胜利果实以后，就大肆向外扩张了。当时，全市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革命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华林森认为这是扩张帮派势力的大好机会，迅速派出人员打入不少革命群众组织，企图把各个群众组织纳入他们那个反革命体系，达不到目的，就搞阴谋诡计，制造分裂，最后把人家搞垮。例如：苏州市成立工人造反司令部时，华林森一伙也参加了，企图控制“苏工司”，但他们没有能够掌握“苏工司”的大权，于是他们便制造种种借口，退出了“苏工司”，另拉队伍，另立山头。这是苏州市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分裂的一个恶劣开端。华林森一伙在退出“苏工司”的同时，和另一个野心家施兆祥进行了“结盟”谈判。一个要拉盟友，一个要找靠山，他们互相勾结起来，欺骗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华林森、汪永珠、邹学琪、赵宝康、施兆祥等人乘机钻入了红革会，窃取了组织的各种大权。在华林森一帮和施兆祥一伙结成帮派联盟以后，华林森的反革命帮派势力就更扩大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也愈来愈大。他们自封为“核心”，提出了名义上“以长风厂为核心”，实际上是以他们一伙为核心在苏州大夺权的口号，进而窃取了全市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成立“苏革会”时，他们明明是一个群众组织的成员，为了多抢几顶官帽，却分成以三个单位的名义参加，华林森以长风厂的名义窃踞了革委会主任的宝座，汪永珠以红革会名义，施兆祥以“机关司”名义钻进了常委。他们还论功行赏，封官晋爵，凡为他们出力卖命的帮兄弟都大小有个乌纱帽。华林森还广收门徒，招降纳叛，把黑手伸到全市各个方面，开始了他们结帮拉派、篡党夺权的新阶段。



## 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体系是怎样扩展起来的？

华林森这个帮派体系是在“四人帮”的支持下，通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以及利用历次政治运动，另搞一套，扩展起来的一股反动势力。华林森一伙在扩展帮派体系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这里我们列举几种主要手法：

手法之一：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群众队伍，挑动武斗，从而扩展他们的帮派势力。资产阶级派性，是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命根子。华林森这一伙从投机造反到同“四人帮”一起垮台，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煽动资产阶级派性，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利用资产阶级派性来扩展他们那个帮派体系，掩护他们搞各种反革命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华林森一伙就是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干部和群众队伍，挑动武斗，制造全面内战，破坏革命大联合，把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打下去，来扩展他们那个帮派体系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再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四人帮”却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叛徒江青公然抛出“文攻武卫”的反革命口号。在苏州，华林森一伙以及混进群众组织中的少数坏人，在“文攻武卫”反动口号的蛊惑下，唯恐天下不乱，大搞武斗，掀起了全面内战，严重干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些坏家伙，有的已得到应有的惩罚，有的已受到群众的斗争和批判，而华林森一伙却在“四人帮”的庇护下滑过去了。他们对苏州市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没有得到清算。他们那个反革命帮派中许多重要成员，如邹学祺、陈德滋、曹根男、刘山海、张世琪、朱炳章、金志远、庄俊峰等人都是靠武斗起家的。那个地痞流氓曹根男，就是在违背中央“六六通令”，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武斗的过程中，自封为“赤脚司令”的。他曾恶狠狠地叫嚷：“啥个通令、通知，照这些东西还好办啥事体”。他还扬言：“管他七条八条，我侬只有扁担一条”！那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邹学祺、曹根男等人多次开会策划，挑动农民进城武斗。驻苏部队首长一再制止他们这样做，郊区贫下中农也反对他们这样做。他们根本不理，拼命要搞武斗。曹根男竟当众把“七·一三”通知撕得粉碎，邹学祺则充任武斗指挥部的黑司令。这帮家伙在武斗中密谋策划，煽风点火，赤膊上阵，大打出手，为华林森重用，成为华林森帮派的核心力量。

一九六八年初，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苏州市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专门作了重要指示，全市人民兴高采烈，坚决要求落实。可是，华林森一伙却怕得要死，阳奉阴违，拚命反对，竟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总理的指示，用资产阶级派性冲击总理指示的落实，致使我市内战长期不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华林森一伙大肆扩大和利用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来镇压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骇人听闻的所谓“智囊团案件”，就是华林森一伙制造的假案。他们先向一部分老干部开刀，然后用这个假案来吓唬群众，镇压群众，他们诬告七十多名区局干部，是分裂群众组织，挑动武斗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把这些老干部关进私牢，严刑拷打，有的打得死去活来，甚至还有蒙了眼睛拉出去假枪毙的等等。致使有的同志受了伤，有的直至被打死。华林森就是用这个“智囊团”假案来打倒一大批干部，为扩展这个帮派势力扫清障碍的。



手法之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抢旗子，另搞一套，扩展帮派体系。

在清查“5·16”的过程中，华林森一伙就是用了这个反革命手法。清查“5·16”，中央有文件，清查范围、清查对象很明确。可是，华林森一伙为了排斥异己、扫除障碍，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跟着吴大胜搞扩大化，继续打倒一大片。当时，邹学祺是专门负责清查工作的二办副主任。他背着党委一下子私自排了二百多人的名单，说这些人是“5·16”。邹学祺还大肆攻击隔离审查要经批准的规定，狂叫：“革命那要先经批准？”肆意大搞扩大化。邹学祺攻击市委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是“老右”。邹学祺为了要反“老右”，特意离开二办，表示不愿干这个束缚手脚的副主任。回到总工会后，邹学祺就放开手脚大抓特抓起“5·16”。他把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笔记本上所记的名单，全部当作“5·16”来抓。他们完全不顾毛主席多次强调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指示，大搞逼供信。他们任意抓人，关人，甚至用法西斯手段，对待广大干部和群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是，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这帮野心家、阴谋家却把脸一抹，摇身一变，一个个抢戴“5·16”的帽子，把自己装成“清查5·16”的受害者。他们无耻造谣说，支左干部把他们打成“5·16”。他们还极端卑鄙地编造了一个有人要把华林森打成“5·16”的谣言。当时，他们把公安部门的一个支左干部的笔记本通过非法抄家拿来，这本笔记本上记录了敌情动态。上面记录了一个敌对分子说的话：“华林森是5·16，曲言斌也是5·16”。他们把这句话前后遮盖起来，单把“华林森是5·16”这几字拍成了照片，又从商业系统找了个亲信作假证人，这样，有人要把华林森打成“5·16”的谣言就出笼了。当初，大骂人家“老右”的那个邹学祺，这时也大抢“5·16”的帽子啦。他造谣说，“为什么我要离开二办，是因为要清查我”。他们就是这样，把一盆污水泼到别人身上，既陷害别人，又开脱了自己的罪责。他们在抛出的那个《告全市人民书》的黑文告里，还使尽了倒打一耙的手法。他们就是靠这种手法扩展帮派势力的。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华林森一伙乘机抢过旗子，另搞一套，来掩盖他同林彪的黑关系。来扩展他们那个帮派体系。他们扯起了批所谓“两否定一回潮”的旗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大整一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他们在所谓组工会议上，一下子点了五十七个区局干部的名，大骂这个“走资派”，那个“老右”。他们利用控制的群团组织，凌驾于市委和各级党委之上，炮制了一份所谓“告全市干部书”，以太上皇的架势和流氓的语气，公然否定毛主席关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基本估计，完全不顾广大干部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焕发革命青春的事实，把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毫无根据地排成“三大类”骂得一无是处。他们给这些领导干部戴上了“复辟派”、“走资派”的帽子。接着他们又把矛头指向在苏州“三支两军”作出贡献的军队干部，为扩展他们反革命帮派势力扫清道路。

手法之三：排斥异己、扫除障碍，为扩张帮派体系铺平道路

多年来，华林森一伙为了扩展帮派体系，对抵制他们结帮篡权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排斥异己，扫除障碍，以便在苏州市建立他们的帮天下。凡是不跟他们跑的干部、群众，都被看作“异己力量”，制造种种借口，“穿小鞋”、“扣帽子”、“打棍子”甚至炮制假案，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曾经轰动一时的所谓“抽血集团”，就是华林森帮派排斥异己用收买、恫吓、拷打等法西斯手段，进行逼供、诱供、指供，捏造假材料、炮制假证人，搞出的一个假案。他们利



用这个假案，大肆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制造反革命舆论。对华林森反革命帮派的这种胡作非为的恶劣行径，参加专案工作的一些同志曾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因此，这个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华林森帮派就是这样不择手段的镇压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至于运用“第二武装”镇压群众，如镇压江苏师院工农兵学员的《六·二》《六·三》事件，以及他们干的种种法西斯罪行，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妨碍他们“三搞一篡”的干部，他们更不放过，千方百计地进行打击和迫害。在区局干部会议上经常演出围攻革命老干部的闹剧。对敢于抵制他们，同他们针锋相对作斗争的干部，打击迫害的手段，更是毒辣。如对第四房管所党支部副书记李水林同志的绑架殴打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例。早在一九七一年赵宝康企图利用职权霸占一家私房，硬要第四房管所拿出公房对调，这种无理要求被李水林同志理所当然的顶掉了，赵宝康从此怀恨在心。一九七三年汪永珠利用职权批条子给第四房管所，要他们给长风厂一个职工解决住房，但因不符合规定，也给李水林同志顶了回去。这下可触犯了那个帮派女掌柜的尊严。她恼羞成怒，把李水林找去进行训斥，并给李水林同志扣上了“不关心群众”的大帽子。李水林同志当即予以驳斥说：“你说要关心群众是对的，但是我认为你首先应该关心全市五十四万人民群众”。一句话把汪永珠弄得狼狈不堪。她只得恶狠狠地说：“好！你看着办吧！”以后，李水林同志在处理一件长风厂职工抢房事件时，他们乘机煽动了长风厂一些人，动用大卡车，带着棍棒，于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晚上闯进李水林同志的家，把她从床上连人带被一裹，边打边拖拽到了汽车上。车子开到市委门口，在赵宝康的支持下，把身上只穿棉毛衫裤的这位女同志，连人带被从车上拽到雪地里。当时，李水林同志被打得不能动弹，小便失禁，处于昏迷状态，曾先后到三院及中医院检查治疗，但是由于华林森帮派在长风厂的那个同伙王如洪亲自出马到医院，百般阻挠破坏治疗，致使李水林同志不得不离开市里的医院，到亲人解放军一〇〇医院去治疗。由于伤势严重，至今尚不能工作。事情发生后，那个华林森不阴不阳地说：“这件事我不管，你们弄你们的。”那个邹学祺则扬着拳头恶狠狠地对人说：“房子问题是不那么好解决的，不采取点行动，解决不了问题。”那个赵宝康更是猖狂，倒打一耙，反要房产公司向他们一伙道歉，真是横行霸道到极点。此后每当华林森的帮兄弟带头抢房时，他们依仗帮势，总是对房管部门公开扬言：谁敢动一动，李水林就是你们的下场！

从上述揭发，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华林森一伙为了扩展他们的帮派势力，排除异己，扫除障碍，所采取的手段是十分毒辣的。

手法之四：网罗党羽，培植亲信，扩展帮派体系。

文化大革命以来，华林森一伙总是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着干”，另搞一套。在另搞一套中，凡是紧跟他们的，为他们充当“特务”、“打手”、“小耳朵”的，都成了他们帮派的重要骨干。华林森自称“老虎”，在苏州坐山为王，他的一帮小兄弟公开扬言，我们是“亲华大学”毕业的，是“亲华（林森）派”。就是这批“亲华派”，在苏州市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效忠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这个帮派体系，有指挥系统、组织系统、情报系统、舆论系统和武装系统。他们控制的“指挥系统”，凌驾于党委之上，发号施令；他们控制的组织系统，专搞结帮篡党，排斥异己，培植亲信，掌握各个要害部门；他们的情报系统，专干特务活动，派遣坐探，小耳朵，暗中盯梢，窃听电话，私拆信件，甚至动用微型录音机等特务工具，搜集情报，私整黑材料；他们的舆论系统，网罗了一批文痞，炮制黑文，颠倒是非，造谣惑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再有一个，就是由现行反革命分子



刘山海、张世琪控制的第二武装——民兵指挥部，大搞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华林森一伙仗着上述系统中他们的帮兄弟，盘踞了一些重要岗位，窃取了党、政、财、文大权，形成了一个和党组织相对立的反革命帮派体系。

华林森一伙是一些权欲薰心，官迷心窍的家伙。华林森自己一心想当“江苏王”，还以官、禄、德拢络人心，发党票，发官票，以名利引诱，以财物腐蚀，只要你肯为帮派卖命，要官有官，要钱有钱，要房子有房子，总之要啥有啥。他们今天封这个可当区委书记，明天又许那个当组织部长。一个市委宣传部长的位子，同时给五个人许了愿。那个文痞陈德滋先后给封了六顶乌纱帽。

华林森一伙为了扩展帮派势力，恣意践踏党规党法，大搞“双突”，公然篡改党员标准和接班人五项条件，搞什么“指名入党”、“限期入党”、“飞过海入党”、“下命令入党”、“派人监督入党”，千方百计的把那些地痞、流氓、犯罪分子以至反革命分子拉入党内，委以重任。

华林森反革命帮派还采用威胁利诱、打拉结合的两手，分化瓦解“对立面”，拖人入帮。那个上窜下跳官迷心窍的王烈，就是由华林森一伙的“死对头”成了“亲华派”的得力干将。另一个女人，凭着一卷为华林森歌功颂德录音带，就委以局核心组成员，局负责人的头衔。

华林森一伙就是利用以上这些主要手法扩展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的。他们这一伙，完全是一批比豺狼还狠毒的反革命黑帮，是从属于四人帮的一股反动势力。

## 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体系的基本队伍是什么货色？

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体系的基本队伍是些什么货色呢？除了我们已经揭发批判过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刘山海、张世琪和市郊的所谓“四大司令”这些黑色人物以外，华林森帮派的基本队伍还包括以下几类人物。

一类是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至今仍然本性不改，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家伙。华林森安插在市粮油系统的亲信金志远是其中一个。金志远出身于反动的剥削阶级家庭，他从小思想就十分反动，认过汪伪汉奸、蒋匪军官校长为干爹。他在一九四六年的反动日记中肉麻吹捧蒋该死，要以蒋介石的“人格”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他恶毒咒骂共产党、新四军，疯狂诽谤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一九四八年，全国即将解放，他准备逃往台湾未逞。解放后，他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一直保存了上面这些黑日记。一九五七年，他向党猖狂进攻，谩骂党的领导干部是“饱食终日”“聋耳瞎眼”“无德缺才”的“和尚、道士”。他实际上是个漏网右派。文化大革命，他投机“造反”，在华林森羽翼下进行“三搞一篡”的反革命活动，在华林森帮派结帮篡党复辟罪恶活动中，金志远是跟得紧，冲在前，特别卖力的人物。去年年初，他直接写信给叛徒江青，诬告省委，一月底，又写信给王洪文，攻击省委，吹捧华林森，



他还直接寄材料给“四人帮”亲信迟群。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不久，他就狂呼要“砸烂省、市委老骨头班子。”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金志远还恶毒攻击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什么“走资派算旧帐”，他销毁黑材料，用各种手段对抗运动。审查期间，他还写了五十多首反动诗词，影射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就是这样的反动家伙，却被华林森等人当作掌上明珠，强行拉入党内，委以重任，成为他们帮派的骨干成员。这就充分暴露了华林森帮派的反革命本质。

再一类就是从漏划右派成为极右派的。华林森安插在燃化局的工会负责人顾兰龙，局核心小组成员蒋载天，就是这一类人物。

顾兰龙思想极为反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中，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因此受到全区二十个学校的巡回批斗。到农村劳动期间，他逃到青海鬼混了一年，又窜回苏州，改换名字，隐瞒历史，混进了工人队伍。一九六二年蒋匪帮叫嚣要窜犯大陆时，他蠢蠢欲动，私带粮油户口串到浙江宁波沿海一带，妄图进行反革命活动。文化大革命中，他搞打、砸、抢出了名，得到华林森、邹学琪赏识，被封为燃化局工会组副组长，他依仗帮势，称王称霸、作威作福。群众说：“见到顾兰龙，就象见到当年日本鬼子，见到了地主还乡团一样”。顾兰龙还是个酒鬼“倒头光”，他挥霍无度，到处借钱，挪用公款。“四人帮”粉碎后，他还恶毒攻击华主席和党中央。这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家伙却被华林森当作宝贝。

蒋载天在解放前，全家参加反动道会门，他父亲、哥哥和岳父都有严重问题。解放后他长期隐瞒了政治历史问题，混入革命队伍。一九五七年利用我党整风之机，跳将出来，恶毒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得了三害“绝症”“病入膏肓”，咒骂我们党搞社会主义是“英雄迷梦，整整八载”，狂妄要我们党“下台”。因此，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这个贼心不改的漏网右派，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翻案复辟的时机，他在一九七〇年的翻案信中还猖狂叫嚣：“一九五七年我写的这些大字报基本精神是符合事实的，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死跟华林森一伙上窜下跳，充当华林森乱省篡权的马前卒和急先锋，干尽了坏事，从漏网右派到极右派，这就是蒋载天走过的道路。华林森帮派把邹学琪、蒋载天、顾兰龙这一类右派分子当作依靠力量和基本骨干，就彻底剥去了这个帮派假左派的伪装，暴露出他们真右派嘴脸。

另一类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黄玉文就是其中一个。文化大革命初，他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受到群众的揭发批判。因此，他对文化大革命极为不满，嚎叫“文化大革命把我家弄得妻离子散，苦诉不完，我永远忘不了”。后来黄玉文抱着反革命目的，一头栽进了华林森反革命帮派，大耍阴谋，大搞分裂，并依靠帮势，混进了交通局革委会。他残酷迫害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他根本无视党纪国法，私设牢房，任意抓人打人，草菅人命。他用种种手法，蒙骗了一些人，作为他的希特勒式的“冲锋队”到处胡作非为，去年二月十二日，在华林森一伙的指使下，经过他密谋策划，精心准备，出动了十几辆汽车，四百多人冲砸了市委，制造了“二·一二”事件。“四人帮”粉碎以后，他竭力为“四人帮”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毛主席、华主席，狂叫“中国革命到此结束了”。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家伙，却被华林森等人捧为什么“老革命”、“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机械系统一霸吴成礼，曾当过伪军，后被我俘虏。入伍后，他不思改造，是个专横跋扈，特权自私，灵魂十分肮脏的家伙。他一贯称王称霸。他曾公开扬言“党总支就是大老吴，大老吴就是党总支”，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他在厂里吃饭，要食堂专门准备，饭菜要端到他手里，他抽香烟要人垫款代买，月终由代买人申请补助，经他批准，“报销”了事。有次，他老婆想要吃高级补品——阿胶，他叫厂里的同志在东北代买了三斤，化了二十二元伍角，他又叫代买同志申请补助三十元，为他付钱，甚至连余下的柒元伍角他也捞进自己的口袋。

就是这样一个家伙，却为华林森看中，百般宠爱，吴成礼则卖身投靠，积极参予华林森帮派“三搞一篡”的阴谋活动，为了扩张这个帮派势力，他拼命把华林森的三名小兄弟突击拉入党内，突击提拔成干部，有的安插为厂总支书记、有的为厂支部书记、有的为局共青团工作小组负责人。他效法华林森大搞法西斯专政，搞了一个“劳动教育学习班”，在二年四个月的时间内，抓捕和关押二百十二人。吴成礼那种倒行逆施，胡作非为激起干部和职工的义愤。76年3月26日有几个同志贴了他的大字报。吴成礼暴跳如雷，仗势压人。华林森为吴成礼撑腰，说什么：“厂里这样搞，主要不是对着吴成礼一个人”。吴成礼就说：“反我是假，反华林森是真”，叫嚷“这是别有用心”，是“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对几十名干部、工人打击、迫害。难怪机械系统广大干部和群众要把他叫做“吴霸天”。

被华林森一帮吹捧为“老革命”、“革命干部代表”的“吴霸天”、“黄霸天”之外，还有他们派在广播电台和二轻局的那两个亲信，所谓老干部。他们卖身投靠的手段也是极其卑鄙的，电台的那个所谓老干部，一次坐在火车上偶然听到两个解放军同志在议论华林森胡作非为的一些问题，他假装看报，暗暗记下他们的谈话，并用跟踪盯梢的特务手段，弄到了这两位同志的住址。回苏后立即给华林森送了小报告，博取主子的欢心。同样，二轻局的那个所谓老干部也是靠无耻吹捧华林森、邹学琪，步步紧跟华林森而被提升为二轻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华林森及其同伙为了“三搞一篡”的罪恶目的看中了这些人，把他们网罗起来。为其反革命目的效劳。我们奉劝曾经被华林森等人吹捧为什么“老革命”“革命干部代表”的那么几个人，要赶快清醒头脑，看清华林森及其同伙的反革命真面目，彻底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们的罪行，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中还有一批穷凶极恶的打砸抢分子。市总工会的王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抱着“要么楼上楼，要么楼下搬砖头”的投机目的，混进群众组织，上窜下跳，大搞打、砸、抢。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带头冲砸机密档案，泄露国家机密，造成严重恶果，曾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后来这个原来是华林森的死对头，却一头栽进华林森怀抱，充当华林森帮派的打手。他官瘾十足，竟去找地下算命瞎子为他算命，那个算命瞎子说：“你快要脱下蓝衫，穿红袍”，就是说快要当上大官了，他高兴得要死连连说：“算得准，算得准”！去年，他参与策划了冲砸市委的“二·一二”事件，并多次带人到南京闹事。因为他一贯打砸抢“有功”，华林森一帮就把他封为市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就是这个“副总指挥”，带头破坏社会治安，经常聚众赌博，当派出所的人员进行干涉时，他竟蛮横地说：“你管不着我！”

冶金厂的孙维国是一个大搞法西斯专政，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所谓“专家”，为华林森赏识安排为厂党委常委，他的手段十分狠毒，连华林森在长风厂的几个心腹对他甘拜下风，请他到厂里介绍搞法西斯审讯的所谓“经验”，他一面讲，一面做“示范动作”，为华林森帮派体系培养一批残暴成性的刽子手。孙维国在冶金厂动不动打人、关人，他私设



牢房，仅七五年七月至七六年九月，就非法关押了四十八人，使一些人在肉体上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折磨。

华林森反革命帮派的基本队伍中，还有一类是流氓恶棍，社会渣滓。如市革会政工组的钱声远、商业局刘水光、延安区的庄俊锋、纺工系统的滕家宝，都是这一类货色。

先说钱声远，他是个政治流氓，长期隐瞒了他父亲当过特务、伪警长、侦缉队等严重问题，而华林森一伙却把他突击拉入党内，又一手遮天，不经省委批准，非法提拔他为市革会政工组副组长。钱声远上台后的第一桩事，就是主持了臭名昭著的所谓市组工会议，在会上作了丑恶的表演。七四年八月，他在省委召开的各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指着到会的老同志，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今天到会的都是你们这些老家伙？大骂到会的老同志是“复辟派”、“儒家”、“走资派”。他大骂省委组织部是“复辟部”，大骂市革会政工组组织组是“复辟组”。平时他的所谓讲话，发言，通篇都是骂人，篡党夺权野心毕露，是个政治流氓。

华林森在商业局的亲信刘水光，家庭出身和主要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他本人立场极为反动，他曾为他的惯窃犯弟弟窝藏赃物，还为他那个死在劳改单位的反动伯父收尸。他一贯假公济私，违法乱纪，就是这么一个货色，被华林森当作宝贝。强行拉入党内，任以要职，并窃取了四届人大代表的称号。刘水光人还未进局核心组，他就以即将上任的核心组副组长的身分，召集会议，并私自拟订领导班子名单。他还说：“局核心组几个老头子都是没有用的，我进了核心组，就不怕控制不了。”他竭力吹捧“张春桥理论水平高”，公开拥护张春桥“当总理”，疯狂反对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去年，他先后组织和指挥了五批人马去南京闹事，并亲自带头翻窗越墙跳进省委办公大楼寻衅闹事，是个十足的政治流氓。

延安区的庄俊锋，是一个社会渣滓。他出身于反动家庭，工作以来一贯对抗组织，贪污盗窃，曾两次被开除公职。华林森一伙把他当作宝贝，妄想拉入党内。庄俊锋则当着华林森的面肉麻地说：“华师傅、汪书记、邹主任，我们都是造反的，你们到华东局，我跟到上海帮你们送开水，战斗在一起。批林批孔，你华师傅叫我参加，我为了啥？还不是为了保卫你华师傅、汪书记、邹主任……华师傅，我和你们是有感情的，我是跟你跟定了。”庄俊锋效忠华林森，华林森重用庄俊锋。庄俊锋不是党员却俨然以区委书记自居，任意向基层发号施令。他公然说：“工会要监督党委”。他对区委领导同志说：“看得起你，同你通通气，给你打个招呼”。完全是一付太上皇面孔。

再说供电局的那个流氓恶棍和打砸抢分子。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结帮拉派，以“左派”自居，专横跋扈，打倒一切。特别严重和恶劣的是，他篡夺了部分权力以后，目无党纪国法，私自外调党员的材料，私自偷阅干部和群众的档案，甚至私自保存档案，他私自涂改档案，偷抽档案。他在不少干部和群众的档案里，塞进不应归档的东西，进行政治陷害，真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

华林森帮派中的流氓恶棍，社会渣滓，除了以上几个家伙以外，还有已逮捕法办的过要武以及华林森安插在无线电局、一轻局那两个亲信。华林森收罗并重用这些人，作为他们帮派的社会基础，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

为了篡党夺权，华林森还网罗一些坐探、小耳朵这类神秘人物为他当特务。教育局的金祖民，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金祖民是赵宝康直接控制的“情报科长”，他随身带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从中央各部委、国防科委到上海市委、市委高干招待所，直到省委的一系列重要电话号码和一些党政军负责同志的办公地点和家庭住址，作为他进行特务活动之用。华林森



有了这些坐探、特务、小耳朵便耳长鼻尖“情况明了”。华林森曾洋洋得意说：“我人在上海，苏州情况却很清楚。”

为了篡党夺权，华林森等人还专门豢养了一批如姚天啸、陆介昌那样的反动文痞为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服务。

一贯流氓成性的姚天啸，立场反动，黑话连篇。是一个为华林森一帮舞文弄墨的文痞，他为华林森等人炮制了《急风暴雨》的黑剧本，为华汪邹赵一伙树碑立传。陆介昌的家庭出身和主要社会关系极为反动，据揭发查实，他的祖父、父亲、舅舅、姑母等，不是反动军官，就是三青团骨干，或是其他历史反革命，他带着这样反动的阶级烙印，为华林森等人制造反党舆论。炮制反党黑文，起草反党报告。“四人帮”垮台前夕，他凭着那特有的反革命嗅觉，窜到他的原工作单位狂叫：“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了，张春桥等左派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们不能再等了，要勇敢地站出来！”真是杀气腾腾，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

华林森等人为了严密控制苏州，还把黑手伸进了市公安局，华林森为了掌握这把刀子，就把他的那个亲信派到那里，专门破坏捣乱，这个家伙完全按照华林森的黑旨意，颠倒敌我关系，竟在全市性大会上叫嚷：“地富反坏”、“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不是“打击的重点”，妄图把打击的矛头指向革命的老干部，至于牛鬼蛇神，真正的犯罪分子如奸污幼女犯金绍春之流，华林森的这个亲信却百般包庇。

以上揭发只是华林森帮派基本队伍中的一部分，但就从这个侧面，我们也不难看到，华林森反革命帮派就是由这伙新老反革命、漏网右派、政治流氓、打砸抢分子、社会渣滓等结成的一个反革命黑帮，是一个听命于“四人帮”指挥的，乱省篡权的反革命帮派，是一个代表地主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和复辟愿望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他们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们苏州市人民深受其害。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同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体系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是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我们同敌人斗争，决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彻底砸烂华林森反革命帮派体系，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为全面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夺取更大的胜利。